

登高望远

且喜重阳节又来

郑学富

今日重阳。重阳得名于古籍《易经》中的“阳爻为九”，九月初九，是两个阳数合在一起，故曰“重阳”；同时又是两九相重，故又称之为“重九”。重阳节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登高望远、佩茱萸、赏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等习俗。



《月曼清游图 之九月重阳赏菊》，(清)陈牧作

《菊石图》，(清)蒋廷锡作



次咏菊是在天宝十二年(753)重阳节，作《九日曲江》：“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季秋时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晚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这一年的重阳赏菊，杜甫心情还是不错的。

杜甫最后一次重阳赏菊，是在大历二年(767)的夔州。这时的他病魔缠身，虽已是风烛残年，但是赏菊的兴致仍然不减，并赋《九日五首》，倾吐了思家、责己、忆友、怀乡的思想感情。其一写道：“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诗人由因病戒酒、对花感叹、黑猿哀啼、白雁南来，引出思念故乡、忆想弟妹之情，进而表现遭逢战乱、衰老催人的感伤。

到了宋代，赏菊之风更盛，重阳节完全可以称为“赏菊节”或“菊花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北宋汴京菊花的种类：“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者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

明清时期，重阳赏菊、饮菊花酒很是盛行。在京城，几乎家家种菊花，富贵人家往往要种上数百盆，在重阳节时用盆菊堆成前低后高的山形，称为“菊花山子”。《燕京岁时记》载：“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度广厦中，前轩后轩，望之若山，曰‘菊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

当时京城的菊花品种繁多，《燕京岁时记》引《日下旧闻考》曰：“盖京师之菊种极繁，有陈秧、新秧、粗秧、细秧之别。”明朝迁都北京后，种菊艺人云集京城，菊花已达900多种，到了清代，已逾千种。《帝京岁时纪胜》说：“秋日家家胜裁黄菊，采自丰台，品类极多。惟黄金带、白玉团、旧朝衣、老僧衲为最雅。酒垆茶设，亦多栽黄菊，于街巷贴市招曰：某馆肆新堆菊花山可观。”

当时北京天宁寺是赏菊的好去处。天宁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曾称为“光林寺”“天王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明正统年间重修时改名“天宁寺”。从明朝末年开始，天宁寺逐渐成为京城赏花、拜佛的好去处。到了清代，寺中设有花圃，花卉繁茂，花团似锦，尤以多姿貌美的菊花繁多而闻名京城，成为金秋登高赏菊游历的好地方。清代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咏》曾有诗曰：“天宁寺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又开，赢得倾城车马动，看花齐带玉人来。”

赏菊茶必饮菊花酒。菊花酒是由菊花与糯米、酒曲酿制而成的酒，古称长寿酒，其味清凉甜美，有养肝、明目、健脑、延缓衰老等功效。菊花酒种类繁多，有枸杞菊花酒、花糕菊花酒、白菊花酒等，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古时的菊花酒，是前一年重阳节时酿的。九月初九这天，采下初开的菊花和一点青翠的枝叶，掺和在准备酿酒的粮食中，一起用来酿酒，放置到转年的九月初九，就正好可以饮用了。由此可见，古时的重阳节，不仅要赏菊、饮菊花酒，还要将第二年的菊花酒酿好。

宋代词人陈著有词曰：“且喜重阳节又来，黄菊先发。”时逢佳节，清秋气爽，菊花盛开，片片金黄。除登高、佩系茱萸外，亲朋好友三五相邀，共食菊花糕，同饮菊花酒，齐赏菊花，也是别有一番古趣。

老人尿频，山茱萸有补肝肾、涩精气、固虚脱的功效，也是一种妇科疾病常用药。

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的茱萸，成为纪念兄弟情谊的寄托。苏轼的词中也多次以茱萸喻兄弟情谊。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重阳节的前一日，苏轼与好友杨绘分袂时写下一首别情词《浣溪沙·重九旧韵》，曰：“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茱萸仔细更重看。”这首小令，词短情长，语言流利平易，抒发了词人离愁别绪，表达了分别后对友人的深深怀念之情。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九月，贬谪黄州的苏轼在重阳节与即将离任的黄州太守徐君猷宴饮于栖霞楼，有感而发作赠别词《醉蓬莱·重九上君猷》，云：“此会应须烂醉，仍把紫萸茱萸，细看重嗅。”诗人以节传话，以酒寄情，颂扬徐君猷的功德，表达二人的深厚情谊。

到了明、清及近代，佩茱萸的习俗逐渐衰退，这是由于重阳节俗的重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登高赏秋与感恩敬老成为重阳节节日活动的两大重要主题，佩系茱萸习俗更是罕见。

可登，“糕”与“高”同音，有人就由登高想到了吃糕，以吃糕代替登高，表示步步高升。《东京梦华录》记载了食重阳糕之习俗：“(重阳节)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送插小旗，掺打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元代方志学家熊梦祥的《析津志》曰：“九月九日，都人以面为糕，馈遗作重阳节。”明代刘侗、于奕正同撰的《帝京景物略》记载：“九月九日……面饼种枣栗，其面星然，曰花糕。糕肆标纸彩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重阳糕借“糕”以及制糕各种佐料的谐音，体现呈祥纳福的美好祝愿。

旧时的重阳糕主要有两类，据《燕京岁时记》记载：“花糕有二种：其一以糯面为之，中央果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栗，乃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间预为制造以供用。”但是，每一类的品种又很繁多，如槽子糕、桃酥、碗糕、蛋糕、萨其马、蒸糕、五色糕等。《帝京岁时纪胜》曰：“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醅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识。”

又称菊花节。赏菊习俗源于菊文化。在中国古俗中，菊是长寿之花，又被文人们赞美为凌霜不屈的象征。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赏菊、饮酒赋诗已成时尚。

谈到赏菊，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晋代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他专门种了一个大菊园，每日从田间回来，便去浇水、培土、捉虫，把心血灌注在菊花上。每逢秋日，当菊花盛开的时候，附近的乡亲、远处的朋友常到陶渊明家做客赏菊，他就摊煎饼、烧菊花款待亲友，亲友走时采菊相送。

“今日送西客，明日又迎东”，来赏菊的客人川流不息，常使陶渊明不能应时去田园耕作。他常想，要是能让菊花一日开，客人一天来，那该多好啊！后来，陶渊明灌溉浇花时，常常对着菊花自言自语道：“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说也奇怪，九月初九那天，菊花真的一齐盛开了，客人们也都在那天来了。亲朋老友，望着满园金菊吟诗作赋，都说菊有情，不负陶栽培。亲友们相约年年重阳一同来赏菊，都称那满园菊花为“重阳菊”。

唐朝时，重阳赏菊已蔚然成风，在唐诗咏重阳的作品中，涉及菊花的比比皆是。在重阳赏菊诗中，杜甫留下的赏菊诗就有10多首。他首

食重阳糕

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重阳节食糕是因为重阳节有登高习俗，而在平原地区无山

赏菊饮酒

重阳节，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所以古人

九九重阳说王维

文章得名

王维(701—761年)，字摩诘，蒲州(今山西运城)人。他年少时就聪明过人，才华早显，二十一岁中进士，由于精通音乐，做了太乐丞。王维任太乐丞期间，为负责音乐、舞蹈的教习，因为伶人私自表演只能给皇帝看的黄狮子舞，犯了大不敬罪，王维受到牵连，被贬到济州，做了司仓参军。后来，在张九龄任相时，才被召回京，做了右拾遗，那年王维三十三岁。可没过多久，张九龄罢相免官，朝廷大权落到奸相李林甫手中。王维再受牵连，被贬到凉州。后历任河西节度使判官、监察御史、库部郎中、太子中允等，官终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王维入仕为官，胸怀报国的理想，他的《少年行四首》中有：“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一个满腔热血、舍身报国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

王维以诗名著称于开元、天宝年间，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游宦两都时，“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天宝十五年(756)，安史乱军攻陷长安，王维被关押在菩提寺，他曾服药假称患病。但是，安禄山仍仰仗他的名气，硬授予他伪职。

长安收复后，王维因附逆罪名被追责，幸亏一首诗救了他一命。那是安禄山占领长安后，乱军以刀相逼梨园弟子作乐，其中有一伶人因不愿演奏而被叛军活活肢解。王维听说后有感而发，作诗二首，其中一首七绝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秋风吹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诗有悲悼往昔、思念朝廷、期盼恢复旧日秩序的意思，再加上弟弟王缙愿意削职为他赎罪，王维这才免于死，竟授太子中允。王缙没有上被削职，只是被谪到蜀州为刺史。有元元年(760)夏，王维任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当得

张家康

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又云茱萸会。”文人墨客会在这一天登上高山，“引吟载酒，须尽一生之兴”。他们因此留下了许多关于重阳的诗词歌赋，但最为著名且传诵至今不衰的，还是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逢重阳，我们不由得再次想到这首诗的作者——诗、书、画、乐皆造诣精深的王维。

思亲送别

王维是位早熟的作家，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千百年来，人们在作客他乡、思亲念旧时，每每想到的就是这首诗。王维家在华山之东，故而诗题“忆山东兄弟”。帝都长安繁华热闹，茫茫人海中的少年王维却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孤身客。这里的风土人情、语言习惯，与华山之东的家乡差异太大，使他感到那么的陌生和孤伶。这种感受只能用“独”和连用两个“异”字，方能表述得淋漓尽致。

据《风土记》记载：“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辟除恶气，以御初寒。”到了唐代，此俗盛行。登高插茱萸，王维想到了什么呢？远方的兄弟们一定会因发现遍



《江干雪霁图》局部，王维作

插茱萸的兄弟之中少了我王维，而感到缺憾。不写自己的缺憾而写远方亲人的缺憾，可谓曲折有致而又合乎常情。除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还有很多思亲送别的作品，具有同样的艺术魅力，给我们同样留下了永久的艺术享受。

如《春中田园作》：“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覈泉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春天的景象是那么的生机盎然、富于活力，生活是那么的美好，令人陶醉。端起酒杯本想畅饮，可又忽然停住了，想到远在他乡作客的人，顿时为之惋惜和惆怅。

又如《山中送别》：“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和许多送别诗不同的是，王维不写离亭饯别，而是写送别回家后的思念之情。行人已去，日暮掩扉，离思别绪仍是挥之不去。来年春草又绿的时候，离别的客人你还回来吗？如此作问，可谓匠心独运。

还如《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一经传出，就成为梨园弟子爱唱的歌

曲。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每每唱它，听者无不动容，成为风靡天下的流行歌曲。红豆又称相思豆，多在诗词中寓有相思之意。全诗不离红豆，可又“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把相思之情表达得入木三分。

和“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样，这几首诗中同样有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经典名句，具有沁人心脾、思亲怀乡的艺术感染力。

诗中有画

王维的诗擅用绘画的手法，把自然景象融入他的诗中。如那首《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把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以开阔的画面、雄浑的意境，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太俗。合上诗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

不出两个字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再如《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亩。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白鹭黄鹂，色彩鲜明。白鹭飞行，黄鹂鸣啭，动静相宜。水田漠漠，夏木阴阴。诗人把积雨天的辋川庄写得色彩淡雅，宛若一段画意盎然的小视频。

辋川是陕西蓝田县南的一条溪流，王维一生的不少时光是在这里度过。他与好友裴迪整日登山涉水、饮酒赋诗，过着悠闲清静的日子，也创作了较多的山水田园诗作。这些诗采用构图、透视等绘画技巧，用音响、运动等艺术表现特点，显示出“诗中有画”的意境美。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王维的诗，其妙处在于当你合上书去想象，那诗中的意境宛如画一样，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如《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诗的图像那么清晰，清晨细雨后，酒店柳树旁，王维为朋友饯别。他说：朋友，干了这一杯酒吧，出了阳关，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不舍之情浓缩于酒中，叮嘱挂念融入人酒中。这普普通通的离别竟是那么令人牵肠挂肚，引起千万人的共鸣。难怪这首诗一经传出，很快便在离筵别席上传唱开来，风靡一时。

画中有诗

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对王维的诗和画颇为精准的评价。王维自己也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我的前世可能是位不怎么样的诗人，但应该是位不错的画家，可见王维对自己的画有多么的自信。

王维确实是位艺术天才，能诗、工画、精通音律。《旧唐书·王维传》说：“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李工按之一无差，佩服其精思。”唐玄宗李隆基音乐造诣精深，如果王维没有颇高的艺术修养，不可能被授予太乐丞的官职。

尽管王维存世的画作不多，只留存《江干雪霁图》等几幅，但仅从这几幅作品中也是足以领略到他作画的水准。“画中有诗”是王维最典型的特点，他的画作不仅是水墨的浓淡相宜，也是诗意清新和流畅的表达。

《新唐书·王维传》说王维“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他所创作的作品，是通过水墨的浓淡，表现山水田园旖旎婀娜的风光。他开创的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独具神韵，与着色山水的画法有别，更为朴素淡远、韵味高洁。

王维的画到了宋代，越来越为人们所推重。《宣和画谱》说王维的画“后世推重，亦云维所画不下吴道玄也”，吴道玄就是吴道子，是唐代最为著名的画家之一。《宣和画谱》说王维的画，已经可以与吴道子比肩，可见推崇之高。

苏轼在《王维吴道子画》中曰：“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兰。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翻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轼认为，王维本是一位大诗人，他的诗如香草般秀美芬芳，现在看他的壁画，也如同欣赏他的诗一样的清雅朴实。在苏轼看来，吴道子是高明的画工，而王维的画则形神兼备，物与神游。

到了明代，经书画大家董其昌的推崇，人们从艺术流派及风格上进行探讨，更是肯定了王维的绘画成就，并确定王维是南宗画派的创始人。南宗画派也就是文人水墨山水画派，注重笔墨意境的表现，强调诗情画意。董其昌推崇王维，对后人的影响颇大，中国的水墨山水由此逐渐兴盛，自成一派。